

# 公共空间在开发区周边新社区居民地方感重塑中的作用

## ——以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周边典型社区为例

孔翔 凌琳 陈丹

**摘要** 开发区周边的拆迁安置新社区往往是当地失地农民和外来劳动者混居的空间,居民的地方感比较薄弱,社会矛盾比较复杂。公共空间有可能增进新社区居民交流,从而促成新的社会网络并分享集体记忆,这会有助于增进居民地方感和社区的和谐。结合对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周边典型社区居民的调研,初步验证了社区公共空间对居民地方感的影响机理。结果显示,社区公共空间普遍增进了新社区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交流,有助于构建新社区居民新的社会网络,并为本地居民延续集体记忆以及与外地人分享新的共同记忆创造了条件,进而为地方感的重构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是,两类群体对社区公共空间的利用是非均衡的,其作用不应被高估。

**关键词** 公共空间;地方感;开发区;社区;长沙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 一 引言

滕尼斯最先提出了社区的概念,认为它是建立在血缘、地缘、情感和自然意志之上的富有人情味和认同感的社会文化共同体<sup>[1]</sup>。此后,帕克等提出,社区是在特定地域组织起来的人口,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扎根在所生息的土地,生活在互相依赖的关系中<sup>[2]</sup>,并由此获得“拥有”的感觉和身份的认同<sup>[3]</sup>。而根据希莱里的研究,在 94 个社区的相关定义中,有 69 个包含地域、共同的纽带以及社会交往三方面的含义<sup>[4]</sup>。可见,社区内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所在地域的强烈归属感是社区建设

的重要基础。开发区已经成为我国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重要载体,在对征用城市近郊的农地进行招商引资的过程中,也为失地农民提供了不少拆迁安置的新社区,而产品价值链上加工制造环节在开发区的集聚<sup>[5]</sup>,则为这些新社区带来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由此,开发区周边的新社区常常成为本地失地农民和外来普通劳动者集聚的空间。由于这两类群体都对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充满焦虑,也都面临不熟悉的文化景观和社交网络,故难以快速建立亲密的互动关系和对新社区的归属感。这不仅会威胁到新社区的和谐发展,也可能影响到开发区的功能优化。

另一方面,作为任何人都可以在其中自由活动

**作者简介** 孔翔(1975—),男,湖南长沙人,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下的地方产业与文化空间演变;凌琳(1989—),女,江苏泰州人,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陈丹(1992—),女,湖南湘潭人,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271170)。

**收稿日期** 2015-02-10

**修回日期** 2015-03-19

的空间<sup>[6]</sup>,公共空间有可能成为新社区居民亲密交流的载体,从而在构建社交网络、增进居民认同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社区尺度的公共空间,可能较少包含公共舆论和公共权力等政治生活的价值内容<sup>[7]</sup>,但仍会具有“可见性”和“集体性”等特征<sup>[8]</sup>,是人與人互动的对话性场所和汇聚个体意愿形成集体认知的平台<sup>[9]</sup>。它们还是个人展示自己的地方,这不仅能为个人建构存在感和对地方的认同提供条件,也会为“耳闻目睹”他者的文化意识和行为方式创造机会,因而完全可能在新社区居民的归属感构建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 二 地理学对社区公共空间的相关研究

虽然在政治学研究中公共空间一般被视为公共权力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主要为人们不受政治权力、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等的束缚进行自由、平等地讨论提供平台<sup>[10]</sup>,但在规划学研究中,它主要被视为面向公众开放并进行各种活动的空间。考虑到中国社区公共空间的特点,本文主要从规划学的角度,将社区内的街道、广场、活动中心等居民可以自由进入并使用的公共场所视为社区公共空间。它主要为人们户外活动、游憩交往和对话交流提供便利。

地理学主要从物理空间或社会文化空间的层面来研究社区公共空间。物理空间层面的研究多认为社区公共空间应为居民之间的互动交流提供舒适的环境,其设计和管理应当服务于使用者的需求<sup>[11]</sup>,例如,以良好的步行可达性和适当的环境设施满足人们停留的需求<sup>[12]</sup>;以户外活动环境的改善吸引人们来此小憩、游戏以增进社会交往<sup>[13]</sup>;同时,还要注重适应社区人群的多样化需求,特别是老人、孩子和租户的特殊需求。作为承载社会文化的空间,社区公共空间被认为能促进不同社会阶层或团体的交流、融合,其多元化和包容性也是社区活力的重要来源<sup>[14]</sup>。而不同种族和阶层的居住者若能很舒适地在公共空间与他人共处,还会优化社区的民主结构<sup>[15]</sup>,从而增进居民的归属感,使社区由生活的共同体演变成信念的共同体,并推进基层社会的动员整合<sup>[16]</sup>。这也有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居民地方感的强化<sup>[17-18]</sup>,创造对社区的认同。由此,社区公共空间便成为维系不同群体间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这也是美国“新城市主义”主张公共空间应当重

新成为住区建筑与空间的焦点和邻里活动中心的重要原因<sup>[19]</sup>。

作为一类重要的空间形式,公共空间在地理学的相关研究远不如社会学丰富。在社区层面,也很少关注不同类型社区公共空间的建设特点和功能差异。本文主要结合对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长沙经开区”)周边典型社区居民的调研,初步探索开发区周边新建社区公共空间的使用特点及其对居民地方感构建的可能影响,希冀对这类新社区的和谐发展有所裨益。

## 三 社区公共空间与居民地方感的构建

### 1. 社区居民地方感的构建机理

#### (1) 地方感与社区地方感

地方感是人在与特定地方长期相互作用并投入情感的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sup>[20]</sup>,是一类特殊的人地关系,也是把“空间”转变为“地方”的基础<sup>[21]</sup>,并赋予个体或集体以身份感和安全感。地方感的构建不仅体现了个体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更反映了人与地方之间的社会联结,每一个人的“公共参与”以及对特定地方的人群持续产生爱与信任,是构建地方认同的重要基础<sup>[22]</sup>。地方也由此超越人类活动的物理背景,成为自我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而回答了“我是谁”以及“我在哪里”的问题。虽然不少研究强调“地方芭蕾”等人地互动的深度体验在地方感形成中的价值<sup>[23]</sup>,但人地互动更多表现为特定地方上的人人互动,“地方芭蕾”也往往是与特定地方的人分享共同记忆的过程<sup>[24]</sup>。在社区居民地方感的形成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网络和信任环境的形成对于提升认同度和归属感尤其具有重要价值。

段义孚观察到,人们对一些传统社区的依恋已经达到根深蒂固的地步<sup>[25]</sup>。约翰斯顿认为,社区是能够使人产生很强依附感的地方<sup>[26]</sup>。而雷尔夫等则强调,经由人的居住以及充满意义的“真实的”经验或动人事件,能够增进个体或群体对社区的认同感、安全感以及关怀<sup>[21]</sup>。可见,社区是在普遍意义上让普通老百姓通过长期居住、生活而产生地方感的地方<sup>[27]</sup>,社区地方感包含着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与互动交流中形成的共同价值理念,社区意识、社区精神、社区情感和社区危机也都是与地方密切关联的概念<sup>[28]</sup>,人们在社区日常空间的体验、经历都是地方感构建的重要基础。作为一种内隐的心理结

构,社区地方感会在居民搬离时表现得特别明显<sup>[29]</sup>。城市新动迁居民会由于对新居住空间的不熟悉、邻里关系的淡泊等原因,对新的社区产生冷漠和恐惧的心理<sup>[30]</sup>,而邻里、社区的拆除或搬迁也会影响居民对地方的记忆与情感<sup>[31]</sup>。社区在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地方意义,可以通过共同的记忆和传统的积累得到解释<sup>[32]</sup>。在郊区化过程中对农村社区的地方依恋和社区认同的丧失,被证明会对年轻人产生负面影响<sup>[33]</sup>。但若能为新环境注入原居住地的元素,则有助于维系已有的地方情感联系<sup>[34]</sup>,而不合适的环境整修则可能导致居民因失去熟悉的社会环境而搬离,甚至导致社区的瓦解<sup>[35]</sup>。那些社区地方感强的居民,会更为关注社区的变化<sup>[36]</sup>,从而成为社区发展的积极力量。可见,社区是地方感的重要空间维度,社区地方感构建对于社区的持续和谐发展和居民的自我认同均具有重要的价值。

### (2) 社会网络与社区地方感

社会网络的构建有助于个体间的交流互动,从而为建立对社区的情感联系奠定基础。卡萨达等认为,居民在社区内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会增强人们的社区归属感<sup>[37]</sup>。格尔森认为,人们在社区内的社会关系会影响到留居或离开这个社区的选择<sup>[38]</sup>。居民在社区内的社会关系是研究社区地方感的一个重要方面<sup>[39]</sup>,即使是参与社区的非正式活动,也会有助于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sup>[40]</sup>。这可能是由于强烈的邻里连结来自人际之间的相互交流<sup>[35]</sup>,使得在社区中拥有较多亲密朋友的被调查者对社区的地方感更强<sup>[41]</sup>。因为居民间的社会网络会促使他们对所在社区注入情感,进而使单纯的社区物理空间逐步演变成具有内聚力的精神场所,社区成员也由此逐步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这又强化了这种基于地缘的社会关系。由于社会网络的构建需要为社区居民提供有效的结识和交流的平台,社区公共空间有可能在人际吸引和促进互动交往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 (3) 集体记忆与社区地方感

所谓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中的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sup>[42]</sup>。它根植于地方,包含了地方的往日<sup>[43]</sup>,并“将我们联系在一起,成为承袭共同传统的群体”<sup>[44]</sup>。在社区地方感的构建中,集体记忆不仅为社区居民提供了相互交流的谈资,也在情感上营造了舒适、信任的感觉,使居民们拥有了可沟通的话语体系,进而产生一种熟悉、依恋的情感。同时,通过集体记忆,人们还会创造地方的意义,并

将地方与自身联结起来。而通过记忆的选择性遗忘,新的社区也会基于新的集体记忆构建新的地方认同。

### 2. 公共空间在居民地方感构建中的可能影响

居民地方感的构建既是个体的,也是集体的,反映了人与地方之间的社会联结,需要以形成特定地方政治和文化的“共同体”为基础。它不仅依赖于主体间的社会交流网络,也依赖于个体与其他成员分享集体记忆,进而形成共享的信仰和需求。公共空间强调的是“所有人”平等的可进入性,它由此为居民通过互动交流构建网络联系和分享集体记忆提供了开放性的场所,从而在居民的地方感构建中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

#### (1) 社区公共空间有助于增进居民的交流网络

社区居民的交流网络需要以居民在开放性场所相互结识和进行深度的交流为基础。社区公共空间作为可平等进入的开放性平台,完全有可能成为居民社会网络构建的重要载体。奥依斯特的研究显示,社区公园对青少年的社会化以及同伴间社区关系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并有助于弥合不同年龄群体之间的代沟<sup>[45]</sup>。而在人们自由进入并进行各种思想交流的过程中,不仅可能产生一些制度化的组织或制度化的活动形式,而且可能架构起“相对固定下来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结构方式”<sup>[46]</sup>,即某种紧密的社会网络。而城市社区如能建造尺度宜人、利于交往的公共空间,则可能营造类似乡土社区的富有人情味的社会生活,这也使得合理设计公共空间成为不少国家社区设计的重点<sup>[47-48]</sup>。通过社区公共空间的有效交流,参与者不仅会建立密切的联系,更会在潜移默化中共享价值观和地方文化习俗,从而增进对地方的认同和依恋。

#### (2) 社区公共空间有助于延续和创造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往往需要以仪式、风俗等文化实践活动或文献资料等为载体。在社区公共空间,不仅频繁上演着婚庆、丧葬等仪式和节庆活动,也会通过许多口述故事来促进集体记忆的延续。其中,仪式和节庆活动,常常不只是过去事件和情景的简单再现,还会包含许多新的价值认同和文化符号,从而创造出新的集体记忆。而社区居民也在与他人的交谈中,更多地去回忆过往的故事,进而把自己设想为与他人隶属于同样的群体<sup>[49]</sup>。由此,居民通过参与到在社区公共空间举办的仪式和活动以及分享故事,建立了与其他社区成员更紧密的文化认同,并最终形成有机的共同体。集体记忆不仅使社区公

共空间从纯粹的物理空间转变成具有情感意义的场所,更为居民增进对地方的感知、认同和依恋奠定了基础。

总之,社区公共空间是构建社交网络的重要空间载体,它搭建了居民间的交流渠道,有助于增进彼此间的信任,减少隔阂和误会。同时,它也是举行纪念仪式以及讲述故事进而延续和创造集体记忆的场所,对于居民共享地方文化习俗具有重要的价值。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各类主体进入和使用公共空间的能力和效率并非完全一致,这就使得社区公共空间也可能反映出群体之间的隔阂,甚至隔离。因此,社区公共空间对地方感构建的影响不仅在于能否为居民交流提供便利,更在于居民使用社区公共空间的意愿和效率。

#### 四 社区公共空间与长沙经开区周边居民的地方感重构

##### 1. 公共空间对开发区周边新社区居民地方感重构的可能影响

我国的开发区主要是将农业用地转变为工业用地。为解决由此产生的农村聚落拆迁安置问题,开发区周边往往新建了许多以失地农民为业主的小区。这些失地农民虽然获得了一定数量的拆迁款,但也面临生产和生活方式转变的压力。原本熟悉的地方景观在快速工业化进程中消失,原有自然村里的“熟人社会”也闯进了大量新鲜的面孔,再加上对未来经济收入的不确定性和生活开支上涨的担忧,使他们的地方感被明显削弱。另一方面,我国开发区大多集聚的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主要提供低技能、低工资的就业岗位。许多外地普通劳动者集聚于此,并租住在租金较低的拆迁安置小区,他们不仅同样需要适应全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不熟悉的地理景观和社交网络,同时还要面对融入异域文化的挑战,因此地方感更加缺失。由此,开发区周边新建社区成为了本地失地农民和外来普通劳动力集聚的空间,他们都缺乏对开发区和新建社区的地方感,容易产生“无根者”的焦虑和缺少责任感的言行,也容易将不满发泄到其他群体,从而难以真正形成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对社区的归属感。这也是开发区周边社会矛盾复杂的重要内因。

开发区周边新社区不仅是原有多个自然村居民聚集生活的场所,也吸纳了大量普通外来劳动力,这

就使得重构社交网络面临较大困难。尤其是在本地失地农民和外来普通劳动者之间,由于存在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在沟通交流方面存在一定障碍,而共同面临生产、生活新方式和新场所的挑战又会带来较强的竞争意识,从而更可能产生误会,使居民之间的亲切感和对社区的归属感弱化。这些就更需要有便于居民之间深度交流的场所。但由于用地性质的限制,开发区周边一般缺少商业娱乐设施,而不少本地失地农民和外来劳动者的随迁家属则有较多的闲暇时间,这就会产生对公共空间的更大需求。如果开发区周边新社区能有方便停留、环境舒适的公共空间,则能为居民构建新的社交网络提供便利,其能促进社区内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帮助他们构建起社区内的人际交流网络,增进彼此间的互信,并寻找到新的情感依赖场所。而在社区公共空间中的交流,还能促进不同地域文化的扩散与融合,为当地人延续集体记忆以及外地人了解本地文化提供便利,进而为新社区居民分享新的集体记忆创造条件。因此,公共空间不仅可以为本地失地农民提供交流的场所,也能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融入当地社会网络的机会,从而使更多居民拥有共同的生活经验、遵守共同规范的默契以及特有的文化关联,这对于开发区周边新社区居民地方感的构建将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

##### 2. 长沙经开区的基本特点与调研概况

长沙经开区成立于1992年8月,2000年2月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目前已形成以工程机械、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为主导,新材料、食品饮料、轻印包装等为补充的产业发展格局。二十多年来,长沙经开区规划面积从创建之初的20平方公里,逐步扩展到38平方公里、60平方公里、100平方公里。2010年已经完成32.6平方公里的开发建设,周边原有的自然、半自然景观大量向人工景观转化,逐步成为建筑密集、景观多样性下降的新城区。并且,长沙经开区已完成征地拆迁44744亩,动迁群众约21000人;园区已吸引到工业企业近500家,提供了近10万个就业岗位<sup>①</sup>;周边也新建了许多失地农民和外来普通劳动力混居的新社区。本文主要调研的松雅社区和泉塘社区地处长沙经开区核心区(图1)。

其中,松雅社区成立于2005年,由原洋湖、望新、大塘、螺丝等十几个行政村合并而成,常住本地拆迁农民1689户、4280人,流动人口约10000人,社区现有300平方米室外健身休闲广场1个,

活动室 8 个(共计 600 平方米);泉塘社区也成立于 2005 年,共拆迁安置 704 户、3010 人,流动人口约 7650 人,现有两处健身场所(分别为 120 平方米和 150 平方米),它们为居民休闲健身提供了便利(图 2)。



图 1 两社区在长沙经开区的位置

此外,两个社区内一楼商铺外的过渡空间以及棋牌室、图书馆等全室内空间也部分发挥了公共空间的作用。调研主要的受访者是在这些公共空间里活动的社区居民。调研采用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主要记录了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地方感状况以及对社区公共空间的使用状况,尤其关注受访者能否有效利用社区公共空间,能否在此构建社交网络和分享地方集体记忆。调研于 2013 年 11 月进行,采用两人一组、一人交流、一人记录的方法,随机调查了本地居民 76 人,外来租户 161 人,每次访谈持续约 15-20 分钟。

从受访者的基本信息看,男女比例大体接近,年龄层以中青年为主体,本地受访者的居住年限明显较长(表 1),这比较符合开发区周边社区居民结构的特点。调研中发现,有不少本地受访者在社区里开店,而租住于此的外来人员则主要是开发区工人和部分随迁家属,以湖南省内和湖北省的为主,也有部分来自江西、四川、贵州等省。从访谈记录看,开发区建设的确影响到了当地拆迁户的地方感:将近四成的本地受访者认为生活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居住环境的变化,其次是朋友圈子、邻居的变化,然后是生活方式、消费习惯和工作也都发生了变化;而外地受访者也有近半数(45.6%)感受到了类似变化。同时,两类人群都明显感受到当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差异,发现原本习以为常的地方故事没有了合适的交流对象,这使得他们对新社区难以构建深度的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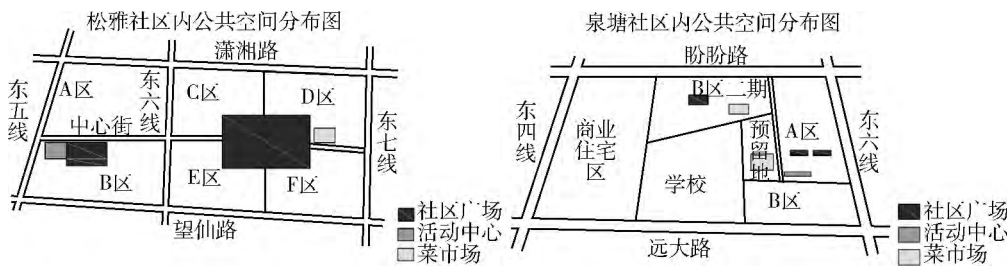


图 2 松雅社区和泉塘社区的公共空间分布

表 1 长沙经开区周边社区受访者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类别		本地受访者		外地受访者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性别	男	40	52.6%	70	43.5%
	女	36	47.4%	91	56.5%
年龄	18-30 岁	25	32.9%	88	54.7%
	31-50 岁	36	47.4%	59	36.6%
	50 岁以上	15	19.7%	14	8.7%
居住年限	1-5 年	40	52.6%	39	24.2%
	6-10 年	36	47.4%	122	75.8%

### 3. 长沙经开区周边社区公共空间建设对居民地方感的影响

本次调研主要关注的是社区居民使用公共空间的状况及影响。从整理的访谈记录看,大多数受访居民使用社区公共空间的频率较高,无论本地或外地受访者都有半数以上每天至少一次前往社区公共空间参加活动,接近七成的本地受访者和半数外地受访者每次在公共空间逗留的时间平均在一小时左

右。虽然观察到的公共空间活动主体是以本地年纪较大的失地农民和外地带小孩的妇女为主,但访谈显示,大多数老人和妇女会与家人分享来自公共空间的信息,特别是超过三成的上班族在业余时间会来公共空间休闲,这显示各类群体都直接或间接受到公共空间活动的影响。在公共空间的使用上,外地人多在社区广场锻炼和聊天,而本地人则多在社区楼下打牌、聊天,因此两个群体之间的交流相对有限,但这对于居民构建社交网络仍是积极有益的。分别有44%和18%的受访者认为社区广场和小区内的店铺是认识新朋友最多的地方,84%的外地受访者在社区公共空间认识了很多当地人或者同乡,仅有16%的外地受访者基本未在公共空间认识新朋友,这就表明公共空间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受访者认识新朋友的场所。同时,寻找情感依赖已经成为受访者前往公共空间的重要动因:有四成左右的受访者表示,经常来公共空间只是单纯地感觉在此聊天很惬意;近三成的表示,如果没有公共空间虽不知道哪里不方便,但就会觉得很无聊;超过八成的外地受访者因为“没有地方去”会常来公共空间,而公共空间也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在没有社区广场前,我们并不太认识附近的人,而现在很多人成了常在一起玩的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换日常生活的信息,包括购物、交通与日常必需的事物等等,有种大家庭的感觉”(QT-10)。本地受访者也认为“以前会串门、现在不串门了,大家都住在楼里面,也不想麻烦”(QT-29);“我们都是来自附近的,有的是在原来村子上认识的,有的是在这里认识的。以前还有农活,现在闲啊……觉得很空洞很单调……出来一活动,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又结识了一些新人……我们来此就是为了聊天,心情愉快”(SY-3)。而且还有不少受访者会因此感到“我们就是社区的主人……去别的社区感觉像个外人……我们要出去就代表松雅社区……还感到蛮自豪的”(SY-41)<sup>②</sup>。可见,社区公共空间不仅已经成为居民重构社交网络的重要平台,还对居民地方感的建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延续和创造居民集体记忆方面,社区公共空间首先是本地居民举办传统节庆活动和婚礼、寿宴等民俗仪式的重要场所。超过64.1%的本地受访者能通过此类活动分享记忆中的地方和生活场景,而外地人也能由此了解到更多的当地传统文化习俗。不少年纪较长的本地人还会在公共空间为外地人讲述老长沙和经开区的历史故事,因为“以前种

地,没时间,现在空了,聊聊天,分享信息,更能融入新的生活环境,也能了解其他人的文化生活”(QT-49)。这对两类群体共享新的集体记忆具有基础性作用。调研期间,适逢松雅社区广场上演花鼓戏,近2000居民自带板凳汇聚于此。受访的李焱驰说:“这场《寻儿记》,我每句都晓得唱咧!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今天见着演员现场演出了,真是高兴。”(SY-16)不少看戏的居民表示,这里不时有演出,观看演出不仅能回味过去的生活,还能与新老朋友聊天,也与更多新邻居有了交流的机会和共同语言。这表明公共空间的确能服务于创造新的集体记忆。

不过调研也显示,社区公共空间的利用还存在不少问题,例如,虽然外地居民更希望使用公共空间,但本地居民对公共空间的利用频率明显更高。由于很少有机会参加街道组织的文艺团队等正式活动,不少外来务工者参与社区活动的频率较低,积极性也不高。而且,本地居民和外来务工者使用公共空间的时空特点也不同:热闹的社区广场上主要是带孩子的外地妇女和做游戏的外地年轻人,也有少部分年纪较长的本地人在此闲聊;而居民楼下则有不少本地人在打牌、聊天,比较安静,虽然白天社区广场主要是外地妇女带着孩子游戏,但傍晚主要还是本地老年人在跳广场舞。两类群体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方式使用不同类型的公共空间,这不利于增进他们之间的交流。此外,语言和文化习惯的差异也使得两个群体在公共空间的交流存在障碍。不少本地受访者表示,“与外地人交流不多,大家语言也不通”(SY-21),而外地受访者也表示,“跟本地人交流少,看热闹时会搭搭话;本地人的活动多,但自己主要是看热闹”(QT-51)。本地人的优越感也会抑制跨群体的交流,不少外地受访者表示,本地人有抱团现象,比较排斥外来务工人员,参加各类文娱比赛大都只有本地人,因此“认识的人都是外地的,就认识自己那一栋的本地人”(SY-63),而本地人也只是和“同一栋楼的(外地人)打打招呼”(SY-7),两类群体之间并未通过公共空间增进交流和互信。

## 五 结论

社区公共空间是社区居民扩大社交网络和分享集体记忆的重要空间载体,而居民地方感的构建也需要以主体间的互动交流为基础。因此,社区公共空间在新建社区居民地方感的构建中可以发挥积极

的作用。开发区周边新建社区常常是本地失地农民和外来劳动者混居的空间,居民的地方感比较薄弱,社会矛盾比较复杂,亟需发挥公共空间的作用,为居民重构社交网络和延续、创造集体记忆提供便利。

对长沙经开区周边泉塘和松雅社区居民的调研访谈显示,社区公共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社区居民之间的交流,业已成为居民寻找情感依赖的重要场所,它同时也有助于传播本地文化,并为本地人和外地人分享新的共同记忆创造条件,这对于增进居民地方感是积极有效的。不过,本地人与外地人使用公共空间的频率和效率存在明显差异,时空特点也有很大不同,语言等文化交流障碍和本地人的优越感更是降低了两类人群在公共空间的交流效果,不利于尽快形成社区居民之间的亲密关系和对地方的归属感。为此,本文建议在开发区周边新社区的建设中应更加注重发挥公共空间的社会交往功能,增强全体居民平等的可进入性,多举办能体现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活动,积极吸纳外地人参与到社区组织的文艺团体和各类其他活动,以使社区公共空间更好地成为所有社区居民平等交流和凝练共识的平台,更好地服务于增进居民对社区和开发区的地方感。

**【Abstract】** The new resettlement residential areas surrounding development zones have often be mixed space of local landless peasants and migrant labors, residents' sense of place there may be weak and thus leads to complicated social contradiction. Public space may be a commendable platform for improving residents' communication in new communities, which may promote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network and the forma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us strengthening residents' sense of place. Based on the survey in typical communities surrounding the Changsha Development Zone, this essay provides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role of public space on residents' sense of place in communities. It shows that public space has generally enhance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locals and migrants in new communities, which promotes the new social network of residents and provides the platform for continuing locals' collective memory as well as sharing some new collective memory among all residents. Therefore, the public space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reconstructing residents' sense of place. However, the utility of public space for locals and migrants may be unbalanced, and its role should not be overestimated.

**【Key words】** public space; sense of place; development zone; community; Changsha

## 注释

- ① 数据根据长沙经开区管委会工作人员的访谈记录整理而得。  
② QT代表泉塘社区,SY代表松雅社区。

## 参考文献

- [1] Tonnies Ferdinand, Loomis, Charles Price. Community & society [M].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7: 10 - 13
- [2] 黎熙元. 现代社区概论 [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8: 20 - 21
- [3] Gaynor Kavanagh. History Curatorship [M].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0
- [4] Hillery, George A. Definitions of Community: Areas of Agreement [M]. Rural Sociology, 1955
- [5] 孔翔, 钱俊杰. 我国大城市近郊的高科技产业发展: 基于产品内分工的视角 [J]. 经济地理, 2009(12): 1985 - 1989
- [6] 凯文·林奇. 城市形态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1: 40 - 42
- [7] 宋立新, 周春山. 西方城市公共空间价值问题研究进展 [J]. 现代城市研究, 2010(12): 90 - 96
- [8] 汉娜·阿伦特. 人的条件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9] 陈竹, 叶珉. 西方城市公共空间理论——探索全面的公共空间理念 [J]. 城市规划, 2009(6): 59 - 65
- [10] 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100 - 105
- [11] Stephen Carr, Mark Francis, Leanne G. Rivlin, Andrew M. Stone. Public Space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12] Whyte W. H. The Social Life of Small Urban Spaces [M]. Washington, D. C.: Conservation Foundation, 1980
- [13] 扬·盖尔. 交往与空间 [M].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2: 80 - 81
- [14] 简·雅各布. 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 [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6
- [15] 塞萨·洛. 城市公园反思: 公共空间与文化差异 [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3: 123 - 126
- [16] 刘中起.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构筑与基层社会的动员整合——基于上海市G社区的案例分析 [J]. 城市观察, 2012(6): 156 - 167
- [17] 郑丽.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对居民社会资本的影响研究 [D]. 中南大学, 2007
- [18] 吴莉萍, 周尚意. 城市化对乡村社区地方感的影响分析——以北京三个乡村社区为例 [J]. 北京社会科学, 2009(2): 30 - 35
- [19] 孔翔. 新城市主义对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启示价值 [J].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2): 30 - 35
- [20] Stokowski P. A. Language of place and discourses of power: constructing new senses of place [J].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2002(4): 368 - 382
- [21] Relph E.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M]. London: Pion, 1976: 25 - 30
- [22] 杨昉. 地方依恋的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J]. 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 2011(2): 26 - 37

- [23] Seaman D. Body – subject ,time – space routines and placeballets [A] ,A Buttimer & P. Seaman. The human experience of space and place [C].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0: 148 – 165
- [24] Jackson J. B. A sense of place ,a sense of time [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25
- [25] Yi – Fu Tuan.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M]. Englewood Cliffs ,N. J. : Prentice – Hall , 1974
- [26] Johnston ,R. J. Derek Gregory ,Geraldine Pratt and Michael Watts [A].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C]. Oxford: Blackwell ,2000: 454 – 456
- [27] 李凡 朱竑 ,黄维. 从地理学视角看城市历史文化景观集体记忆的研究[J]. 人文地理 2010(4) : 60 – 66
- [28] 张中华 张沛 ,王兴中. 地方理论应用社区研究的思考——以阳朔西街旅游社区为例[J]. 地理科学 2009(1) : 141 – 146
- [29] Dixon J. ,Durheim K. Dislocating identity: Desegreg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lace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 2004 24(4) : 455 – 473
- [30] Entrikin N. The Betweenness of Place [M]. Johns Baltimore: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 [31] Porteous J. D. ,Smith S. E. Domicide: the globe destruction of home [M]. Montreal and Kingston: McGill – Queen ’ s University Press 2001: 103
- [32] Corcoran M. P. Place attachment and community sentiment in marginalized neighborhoods: a European case study [J]. Canadian Journal of Urban Research 2002 (2)
- [33] Salamon S. From hometown to nontown: rural community effects of suburbanization [J]. Rural Sociology 2003(1) : 1 – 24
- [34] Brook I. Making here like there: place attachment ,displacement and the urge to garden [J]. Ethics ,Place and Environment 2003 (3) : 227 – 234
- [35] Fried M. Grieving for a lost home. In L. J. Duhl ,The urban condition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3: 151 – 171
- [36] 许振晓等. 居民地方感对区域旅游发展支持度影响——以九寨沟旅游核心社区为例[J]. 地理学报 2009(6) : 736 – 744
- [37] John D. Kasarda ,Morris Janowitz. Community Attachment in Mass Society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1974
- [38] Gerson Kathleen C. Ann Stueve ,Claude Fischer. Attachment to Place: Networks and Places [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7
- [39] Stinner W. F. ,Van Loon M. Community size ,individual social position and community attachment [J]. Rural Sociology ,1990 (4) : 494 – 521
- [40] 丘海雄. 社区归属感——香港与广州的个案比较研究[J]. 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2) : 59 – 63
- [41] Hidalgo M. C. ,Hernandez B. Place attachment: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question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 2001(2211) : 273 – 281
- [42] 莫里斯·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43] Alexander T. Welcome to Old Times: Inserting the Okie Past into California ’ s San Joaquin Valley present [J]. Journal of Cultural Geography 2009 (1) : 71 – 100
- [44] Nuala C. Johnson. Ireland ,the Great War and the Geography of Remembrance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45] Aouest O. Griffet J. Public Space and Community [J]. Space and culture 2004 (2) : 173 – 187
- [46] 曹海林. 村落公共空间: 透视乡村社会秩序生成与重构的一个分析视角[J]. 天府新论 2005(4)
- [47] 王玲. 乡村公共空间与基层社区整合——以川北自然村落 H村为例[J]. 理论与改革 2007(1) : 95 – 97
- [48] 何兰萍. 从公共空间看农村社会控制的弱化[J]. 理论与现代化 2008(2) : 100 – 104
- [49] 陶东风. 记忆是一种文化建构——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J]. 中国图书评论 2010(9) : 69 – 74

(编辑: 王明哲; 责任编辑: 赵 勇)